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钱亚新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联合编辑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钱亚新选集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合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

钱亚新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主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发行组发行
(成都市总府街六号)
成都市自力印刷厂印刷 1988年

字数 100千字 印数1—1000册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88048

3.00元

作者简历



钱亚新，男，1903年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陶都，共产党员。

1928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后，曾从事广东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女师学院、长沙湖南大学等图书馆工作13年；担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育学系，苏州国立社教学院图博学系教授的教育工作8年。

新中国成立后未久，来南京工作，现任南京图书馆研究员，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江苏图书馆学报》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南京大学、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系兼职教授。

主要专著有：《拼音著者号码编制法》（1928年武昌文华公书林），《索引和索引法》（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郑樵校仇略研究》（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浙东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1981年南京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关于论文已经发表有百余篇，内容涉及图书馆学、目录学、索引和索引法，汉字排检法四个方面。解放前刊载于《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科技刊》等，新中国成立后刊载于《图书馆学通讯》、《图书情报知识》、《文献》外，还刊载于沪、津两市和鲁、苏、皖、浙、闽、粤、壮、川等省级图书馆学刊之上。其中《我国图书馆学奠基人—郑樵》（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3期）一文，曾获1985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最近这两年，专为抢救我国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先生遗著，

曾组织人力整编《杜定方先生遗稿文选》，其初集已由《江苏图书馆学报》编辑部作为“专辑”之一，于1987年4月出版了。

自序

图书馆学是我的专业，但是对于目录学，也有很大的兴趣去钻研，因为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遗产，值得探讨而加以发掘的。现在将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所写关于目录学的文章九篇，编成小册。其内容为：

- 1、 《隋书经籍志》新探
- 2、 我国四种公藏目录的研探
 - 2·1 《崇文总目》
 - 2·2 《文渊阁书目》
 - 2·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2·4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
- 3、 龙袤《遂初堂书目》初探
- 4、 试论《百川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价值
- 5、 祁理孙与《奕庆藏书楼书目》
- 6、 百年勤奋，四代心血〔谈谈《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 7、 略论缪荃孙在目录学上的贡献
- 8、 江标与《宋元行格表》
- 9、 余嘉锡与目录学

为什么要选这九篇而不选其他的？除因为篇幅上的限止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要求体现它们的内容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性。

首先可从目录的书藏来讲，可分为公藏与私藏二者。如史志

中的1号《隋书经籍志》属于这一类型外，其中2号的四种也都是公藏。公藏之书是构成中国目录书的一个台柱。但是公藏限于中秘或公共图书馆，但我国二千多年来，私人藏书为数也很多，因此对这类型的藏书，不宜弃之不论，如3—5号的所以选入，可以看到我国藏书的另一支柱。

其次从目录编制的体例来讲，可分为四种类型。最简单的是题录式的，如3号、5号；比较复杂的，是题录加类序式的，如1号2.1号；另一种比较复杂的，是录题加提要式的，如4号的《试论〈百川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价值》；最完备的要推具有题录、类序、提要三者都有这一体例，如2.3号和7号。这四种编辑体例，题录是不可少的，至于类序和提要却可因需要与否来决定。我国古典目录学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中心思想，要体现这种思想非有类序和提要二者兼备不可，然而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要求在大量综合性的藏书目录做到这点，至今尚未出现。这一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再次从分类来讲，经史子集的四分法，自1号以后，影响很大，到了2、3号的完成，可以说达到了高峰。但是四分并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和需要，因此也有以五分来部勒图书的，其中最早的并不是《书目答问》，而是本文中所列的5号，祁理孙之所有把丛书也列为一大类，是继承他的祖父祁承 和父亲祁彪佳的思想和处理图书的方法而来，著之于录却要归功于理孙。除四分五分以外，还有七分的2.4号，它的七分在经史子集以外，加上了志、图、丛三者而成的。至于2.2号的分类也非以四分，比较类目分散，实开明代非四分法的滥，值得注意的。

此外，从版本来讲，一般的说法是以3号的著录为始，其后在明代的目录书中比较的注意了，到了清初修《四库全书》，每书都注明其来源，但还不够详明。自黄丕烈专注于宋版后，当时引起了藏书家的重视，其中以所列7号，曾将有关《四库简明目

录》中各种版本大搜博采，而且经过邵懿辰家四代的勤奋百年以抵于成，这是一本纪录版本较完备的参考书。江标的《宋元行格表》并非藏目，但用宋元刊本的行格来辨别其中版本的同异，这是别开生面的一种版本目录。目前对于古籍还著录行格，就是受了《宋元行格表》一书的影响，而江标的所以特别对比有成就，则是受了黄丕烈的启发。最后，所列九篇中还有几篇，并非专门探讨目录书的，本人认为研读一书，不可不知其著者。因此如3号到9号都曾论及作者，尤其最后一篇，可说是以论人知世为主了。如果本书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帮助，那本人将感到十分欣慰。

钱亚新序于白下
一九八七年六月

目 录

作者简历

自序

1. 《隋书经籍志》新探
 载《图书馆学通讯》1985年1期 (1)
2. 我国四种公藏目录研探
 载《图书馆》1985年4期 (9)
3. 尤袤《遂初堂书目》初探
 载《图书馆学刊》1986年2期 (31)
4. 试论《百川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价值
 载《广东图书馆学刊》1982年1期 (42)
5. 祁理孙与《奕庆藏书楼书目》
 载《图书馆工作》1978年4期 (63)
6. 百年勤奋, 四代心血 (谈谈《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载《广东图书馆学刊》1983年1期 (78)
7. 试论缪荃孙在目录学上的贡献
 载《图书馆杂志》1982年4期 (89)
8. 江标与《宋元行格表》
 载《文献》1986年4期 (90)
9. 余嘉锡与目录学
 载《益阳师专学报》1985年1期 (102)

《隋书经籍志》新探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史志之一。在它的前面有《汉书艺文志》，在它的后面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在这七种史志中，有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占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它来作一些探讨，实有必要。

从《五代史》和《五代史志》

二者说起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建修梁、陈、北齐、北周、北魏、隋等各朝史，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着手编撰，但历时数年，没有成书。629年（贞观三年）重修各朝史。但以《北魏史》已有魏收、魏澹二家，不再复修，仅以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为限，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636年（贞观十年）春正月，房玄龄和魏征上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

这《五代史》的内容，仅有各朝的帝纪和列传，与一般“正史”相比，还缺史志。于是在641年（贞观十五年）诏修《五代史志》，历时十六载，于656年（显庆元年）而书成。《旧唐书》上所谓“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就是指此而言的”。

《五代史》和《五代史志》撰编成书后，把其中的《梁书》、《陈书》、《北周书》、《北齐书》和《隋书》都各自独立成为“正史中”的一种。但由于隋朝的统一中国，又由于《五代史志》的不可分割而入各史，所以就把这《五代史志》十种一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和经籍，全部并入

《隋志》之中。这些就是《隋书经籍志》所以作为《隋书》十志中组成部分的来历。

《隋书经籍志》的撰人

《隋书经籍志》由何人所撰，有几种说法。如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单行本，署名为长孙无忌，这是一种说法。《隋书》既然是由魏征主编，《隋书经籍志》当然应以魏征为撰人，这是又一种说法。《隋书经籍志》是《隋书·十志》之一，也就是《五代史志》之一。修《五代史志》的计有于志宁、令狐德、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五人，这当然可以说《隋书经籍志》是五人的功绩，也就是由此五人合撰的。这是第三种说法。也就是由此五人合撰的。这是第三种说法。这三种说法以何者为胜，还是三者都不对呢？

古代官书的撰述，每每以进呈上书表者为标准的。说长孙无忌为《隋书经籍志》的撰人，这是官样文章，不足为据的。魏征卒于643年（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比《五代史志》撰成那年，即656年（显庆元年），还早十多年，他怎能作为《隋志》的撰人呢？清姚振宗曾谓“是志初修于李延寿、敬播，有网罗汇聚之功；删订于魏郑公，有披荆斩棘之实。”因此有人根据姚氏之说而定《隋志》为李延寿初修，魏征删订。姚氏的考证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对的是《隋志》的确是五人合修《五代史志》时，而由李延寿为主，并请敬播参加的。这在《旧唐书·李延寿传》及李延寿上《南北史表》中可以证实。错的是所谓“删定于魏郑公”一语，是与时间上不大符合，因此也就不可能的。

总之，如不用官样文章而实事求是，《隋书经籍志》的真正撰人应该排除上面开始所引的三种说法，而以李延寿和敬播二人为之，那是肯定无疑的。因此，过去该志出版时用魏征或长孙无

忌为撰人，那是不够正确的。如其在图书馆工作中，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著录，撰人最好是用“李延寿和敬播合撰”为是。

《隋书经籍志》的分类体系

通过魏代郑默的《中经簿》、晋代荀勖的《中经新簿》，四部分类法的体系出现了。东晋李充整理图书，曾把荀勖四部的内容加以调整，变为甲部经、乙部史、丙部子、丁部集，这是当时重视史部书籍的体现。

到了唐初编制了《隋书经籍志》也采用四分法，但其内容大加扩充，其体系如下：

经部：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 孝经 论语 纬 小学

史部：正史 古史 杂史 霸史 起居注 旧事 职官 仪
法 刑法 杂传 地理 谱系 簿录

子部：儒家 道家 法家 名家 墨家 纵横家 杂家 农
学 小说家 兵法 天文 历数 五行 医方

集部：楚辞 别集 总集

除四部以外，还收道经和佛经，其子目为：

道经：经戒 饵服 房中 符录

佛经：大乘经 小乘经 杂经 杂疑经 大乘律 小乘律
杂律 大乘论 小乘论 杂论记

《隋志》分类体系根据何在呢？表面上是好象来于李充，而实际上却由于《汉书艺文志》、《七志》和《七录》。《隋志》经部叙录里说：“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史部叙录里说：“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子部叙录里说：“《汉书》有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集部叙录里说：班固有诗赋略凡五

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这样说来，《隋志》的四部分法，实际上是由《汉志》类目增并而来。至于把道佛二教之书作为附录，这是仿照王俭的《七志》，《隋书》叙录说：“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遇怪，假托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隋志》四部中的经、子、集三者的细目除来自《汉志》以外，其史部的细目可说依据阮孝绪的《七录》中的纪传录而变通形成的。

《七录》纪传体的子目为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十二部，与《隋志》史部十三类相较，有四种情况，即分、合、改、仍。

所谓“分”就是指以《七录》的“国史部”在《隋志》中分为“正史类”、“古史类”、“杂史类”三者而言。所谓“合”，就是指《七录》的“杂传部”和“鬼神部”在《隋志》中合为“杂传类”。所谓“改”，就是指以《七录》的“注历”、“仪典”、“法制”、“伪史”、“土地”、“谱状”六部类在《隋志》中改为“起居注”、“仪注”、“刑法”、“霸史”、“地理”、“谱系”六类。所谓“仍”，就是指“旧事”、“职官”“簿录”三者在双方并未变更，仍袭下来的。

总之，《隋志》的分类体系是由《汉志》、《七志》、《七录》三者的体系综合而来。《隋志·总序》里所谓“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志阮录，挹其流风体制，削其浮杂鄙俚，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这就是四部的四十类和道佛附录的十五类最好的注解。

《隋志》的类序共四十八篇。首有总序一篇，四部有后序四篇，各类有小序四十篇，道佛序二篇，末有后序一篇。前面的四十五篇可以说是本《汉志》大小序体例，说明各大小类的学术源流及其演变，并接上《汉志》。这种类序是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史）重要文献，应该加以重视。

《隋书经籍志》的编目

《隋经》是《五代史志》之一，其收录图书的范围不仅从古到隋，而且存亡并举。其著录项目却较简明，仅有二例。一以书名篇卷为项目，而以撰人为注；一以加文体于撰人后为书名而系以篇卷为项目。如：

周易统例十卷 崔颢撰

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

但是对于书名、篇卷、撰人如有疑义或需要时得加以解释。如：

三苍三卷 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苍颉篇，汉杨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谤喜篇，故曰三苍。

周易十卷 汲冢书，似仲尼删书之余。

* * *

毛诗 一卷 魏司空王基撰，残缺。

晋书八十六卷 本九十三卷，今残缺。晋著作郎王隐撰。

太公六韬五卷 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

* * *

尹文子二卷 尹文，周之处士，游齐稷下。

鬼谷子三卷 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

至于亡佚书目也以夹注方式依类而附于近似现存典籍之下。

如：

三元九宫 甲二卷 梁有 甲三元三卷，亡。

杂露布十二卷 梁有杂檄文十七卷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亡。

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亡。

经史子集各类下著录之书的排列方法，并不严格而有一定的次序。但有些类下再分组排列，如春秋类下则先列左氏传，次公羊传，再次谷梁传，再次春秋外传国语。这样排列好比是有第三级类一般，对于检查方便。

正史类的排列次序，先以《史记》，而后依朝代为次，列出《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北朝的《宋书》、《齐书》、《梁书》、《后魏书》、《陈书》、《周史》等。这种以时为次的排列方法，也是比较清楚的。

如果一个类里附有别的子目，那就先排原属于这类的图书，而后排所附各目的图书，如论语类开始排有关《论语》的，而后排其他的。论语类序最后所谓：“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就是这种排列方式的解释。

在部类大小序之前，有一行记载著录图书存亡数字的统计，如易类里的为：

右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这意思就是说易类里现存图书为 69 部 551 卷。亡佚的图书为 25 部 278 卷。如经部里的为：

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又如最后四部里的，为

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通计亡书，合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七卷。

将四部所现存统计数字，与总序里说的，“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卷”两者相较，不仅见存的相差很大，即使与存亡通计的数字相较，还是见缺不少。这两种统计数字，到底以何者为准，我们认为采用各类、各部后的统计数字比较合理，因为这是以各类图书的存亡为根据的，是比较可靠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在子部各类中除儒家以外，其它“通计亡书”一项都缺而未著。如果要把《隋书经籍志》所收全

部和各类存亡图书的部卷数字弄得一清二楚，还得重新加一番统计工作才好。这种统计对于藏书的多少可以一目了然，但如果不正确，反而使人会产生困惑，以讹传讹。

《隋书经籍志》的特点和影响

《隋志》是我国现在第二部最古的书目，虽属史志，实际上是一个藏目。其特点为：

一、收罗存书丰富 《隋志》“簿录类”中著录各种图书目录 21 种，但未必都有目有书。《隋志》都以见存者为主，亡佚者为附。其见存图书数量据《隋志》所载，附道佛二家不计在内有 14, 466 部 89, 666 卷。其实这个数字并不正确，今以上文所统计 3127 部 36, 708 卷为据，也已相当丰富的。以现存图书为编制目录的张本，这是我国目录学上的一种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对于先唐古籍的品类、流变，尚能考见其大概，主要是靠了《隋志》的记载。

二、建立四分体系 《隋志》分类体系是综合《七略》、《汉志》、《七志》、《七录》各种分类体系而来。当时史籍众多，建立史部实有必要。从此以后，公私目录大抵以四部为组织图书的方法，虽然其后有各种不同的体系。但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究竟未能取而代之为统治地位。四部分法到后来集中表现，则是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三、撰述学术源流 辨章学术，考竟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精髓。《隋志》曾经批评《七志》“文义浅近，未为典则。”批评《七录》“剖析辞义，浅薄不轻。”因为它们对于学术源流都没有什么论述。《隋志》却能继《汉志》的陈轨而加以补充发展，这可说是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后来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出现，更发扬光大，而达到了最高峰。

四、著录方法简明 《隋志》以前的目录除《汉志》以外都不存在了。《隋志》著录方法只有两种，比《汉志》的方法要简单

明易得多。这种著录方法一直在我国流行着，长达一千多年。这不仅可以看出这一特点的突出处，同时也可看出它影响的深远。

参考文献

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校刊本

刘 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校刊本

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校刊本

姚振宗：《隋书新篇志考证》

师石山房丛书本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7 年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

彭斐章等：《目录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

《图书馆通讯》1985 年第二期